

# 恰是一年春好处 “法雨春风”润如酥

## ——我省2021年度“法雨春风进万家”爱民实践活动纪实



(上接1版)

之所以称为“治疗报告”，是因为这是一次针对全省烦企扰民“问题文件”而开展的专项治理。被精准击中的这些“问题文件”，就如同血管中的堵塞障碍，如不及时清理，将会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公信力。

省司法厅政府法律事务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行政规范性文件，人们习惯称之为“红头文件”，是各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抓手，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营商环境和政府形象。

由于这类文件制定主体多、数量大、涉及面广，近年来，尽管我省各地各部门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文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

为此，省司法厅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了烦企扰民规定清理专项行动，将各地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and 各类制度规定中涉及企业民生、行政审批、商事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职业资格许可等方面烦企扰民的条款纳入重点清理范围。

通过浙江日报、省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清理公告，主动将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向全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清理建议；同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纳入清理范围的985件省政府“红头文件”逐一进行评估，形成独立的第三方意见，确保清理工作质量。

精准“治疗”成效显著，长期“保健”更不能少。为进一步推动清理评估工作的制度化，省司法厅已组织起草并将提请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同时加快推进全省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功能库建设，迭代升级业务管理平台。

### 联动服务打出法律服务组合拳

海岛舟山，定海区干览片区新设了快递网点。今年年初，片区有客户投诉快递遗失、延误。总公司根据规章制度对该片区承包人进行罚款，承包人认为并非自己的过错，与总公司发生矛盾，将100余件快递扣押。定海区法律工作者孙剑刚在对企业进行法治体检过程中，查看了双方签订的《揽派合同》，发现当中有许多条款过于简单笼统。针对纠纷，他给出了专业建议，促成双方达成和解；针对合同中的法律风险，他也给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企业对承包人及快递员进行岗前法律培训。

为进一步宣传民法典相关法律问题，嘉兴市组织全市17家律所、30多名律师录制了100个法治微视频，为企业和百姓送上“普法惠企便民大礼包”，内容涉及合同纠纷、权益侵害、交通事故、金融借贷等领域。

强化纠纷隐患的排查，切实把纠纷解决在现场、消灭在萌芽状态；开展法治体检，防范化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法律风险；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的学习宣传……法律服务月期间，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聚集资源、集中力量、集成服务，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不仅如此，各地司法行政部门积极改革创新，推动更多法治力量为企业和群众服务。

2020年底，杭州市拱墅区司法局在远洋乐堤港综合体，首开先河设立了商业综合体矛盾调解中心，主要面向商户、消费者。成立三个月来，化解矛盾纠纷267起，涉及金额171.8万元，群众调查满意率100%。

杭州市富阳区某地块拆迁，涉及搬迁房屋建筑面积

65.6万平方米，房屋类型、产权纠纷情况十分复杂。富阳区组织司法所人员、街道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等入驻指挥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问询等形式了解群众需求，就疑难纠纷、遗留问题等给予专业法律意见，开展矛盾纠纷调处。最终，5939户住户和256户经营户按计划完成签约。如今，一支同样专业的“复合型”法律服务队伍，正活跃在亚运场馆建设的中心工作当中。

### 智慧服务开创数字法治新局面

近年来，浙江省有效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在推进稳定、公平、透明、诚信、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打造形成了数字赋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浙江经验”。

在杭州市临安区，公证人员走访了多家区域内重点企业，就数字信息技术与公证法律服务融合发展与企业进行探讨。“我们主动联系互联网科技企业，围绕公证法律服务以及区块链、云计算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合作研究。”临安公证处负责人介绍，公证处将借助“数信零跑”综合服务平台，推出更多细、惠、实的服务举措。

金华市开展“无证明化”改革试点，建立“无证明城市”数据查询核验系统，开发金E证服务模块，推动“无证明城市”改革向企业、向域外延伸，目前已累计让企业、群众免提交各类证明225万件，满意度达99.99%。

“法雨春风进万家”爱民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司法行政部门着力推进“全程网办”“协同联办”“全省通办”，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本地异地同步，让企业和群众能够“多点、就近、实时”享受服务。

不久前，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一个兄弟单位的求助电话。原来，在宁波市鄞州区工作的杨先生和他的10个工友，被所在的A公司劳务外包给了杭州的B公司。今年3月，杨先生他们因为劳资纠纷，被B公司起诉了，无奈向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接到宁波方面的求助后，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启动了“全省通办”绿色通道，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审查受理了此案，并借助“法律援助统一服务平台”指派浙江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健承办此案。吕健随即赴宁波开展工作，连日忧心的杨先生等人终于松了口气。

云上法律服务律师团入驻各省市外网预警云平台；公证机构积极提供与疫情相关的各类公证线上办服务；应用智能网络仲裁平台，开展“云仲裁”便民服务……普法宣传、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公证、司法鉴定、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务真正实现了“抬头能见、举手能及、扫码可得”，企业和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不断增强。



# 医药反腐升级 近七成已披露年报药企销售费用率下降

新华社 张小洁

在集采常态化和医药反腐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药企销售费用率有所降低。从已披露2020年年报的140家上市药企的情况看，近七成企业销售费用率较上年下降。

近期，多起医药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被曝光。浙江省药械采购中心4月12日通报称，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的鹿瓜多肽注射液在浙江省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按照规定将该公司在浙江省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等级评为“严重”，并按规定暂停该企业鹿瓜多肽注射液的在线交易。4月10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江西一家药企法定代表人涉嫌行贿犯罪接受江西省监委监察调查。2月19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铲除医疗腐败滋生土壤》，再谈医疗腐败问题。

业内专家认为，有关部门一系列打击医药腐败的举措，净化了行业，但从源头上铲除这一毒瘤，还有待更有效的制度建设。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创始人史立臣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治理医药商业贿赂需要综合施策。从供给

端看，同质化的医药产品较多，质量层面难以形成区隔，药企要扩大销量只能通过营销的方式。从医院端看，如果医生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品牌知名度，通过诊疗获取较高收入，则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医药腐败问题。同时，要提高医保谈判药品、带量采购药品的配备率。

记者梳理已披露年报发现，七成上市药企去年销售费用率有所降低。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4日记者发稿时，140家已发布2020年年报的上市药企（剔除未盈利企业）中，98家企业销售费用占营收比例较上年下降，占比70%。

数据显示，上述140家药企去年营业总收入共计9357.42亿元，销售费用共计1284.05亿元，整体看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为13.72%。个股层面，销售费用率超过13.72%的有83家，其中超过30%的有48家，11家企业的销售费用率高于50%，南新制药、康辰药业、赛升药业销售费用率居前，分别为59.10%、58.51%和57.27%，但较2019年的61.28%、59.78%和64.07%均有所降低。此外，一些企业销售费用率明显升高，如三生国健的销售费用率从2019年的31.24%升至56.75%，华熙生物从2019年的

27.65%提升到41.75%。

值得注意的是，与销售费用率相比，上市药企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上述140家药企去年研发投入共计290.32亿元，研发投入占比超过10%的有29家。其中，三生国健研发投入占比居首，达57.31%，微芯生物、贝达药业、信立泰、海思科均超过20%。

对此，史立臣认为，药企营销费用高企与医药市场环境较复杂有关，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回扣问题，也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关，比如新产品上市需要大量资金，当年该产品的销售费用甚至可能高于营收。从研发的角度看，很多企业对于研发方向和如何研发缺少明确的认知，“所以众多CXO企业都从几十家头部药企抢项目，因为这些头部企业有清晰的产品战略规划”。

史立臣表示，在这一轮国内医药行业大转型期，洗牌不可避免，有明确发展方向的企业将越来越强。“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药企都要去做研发，有的企业可能着重药品研发，有的会从事常用药品的规模化生产，有的则多业态发展，都能够实现企业良性发展。”